

始皇帝的 遗产

秦汉帝国

〔日〕鹤间和幸著 马彪译



中国的历史

始皇帝的遗产

秦汉帝国

【日】鹤间和幸著 马彪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CHUUGOKU NO REKISHI (3) FAASUTO ENPERAA NO ISAN

——SHIN KAN TEIKOKU

(C) Kazuyuki Tsuruma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效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版权登记号 20-2012-0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 (日) 鹤间和幸著；马彪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 03)

ISBN 978-7-5495-1146-4

I. ①始… II. ①鹤… ②马…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秦汉时代

IV. ①K23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037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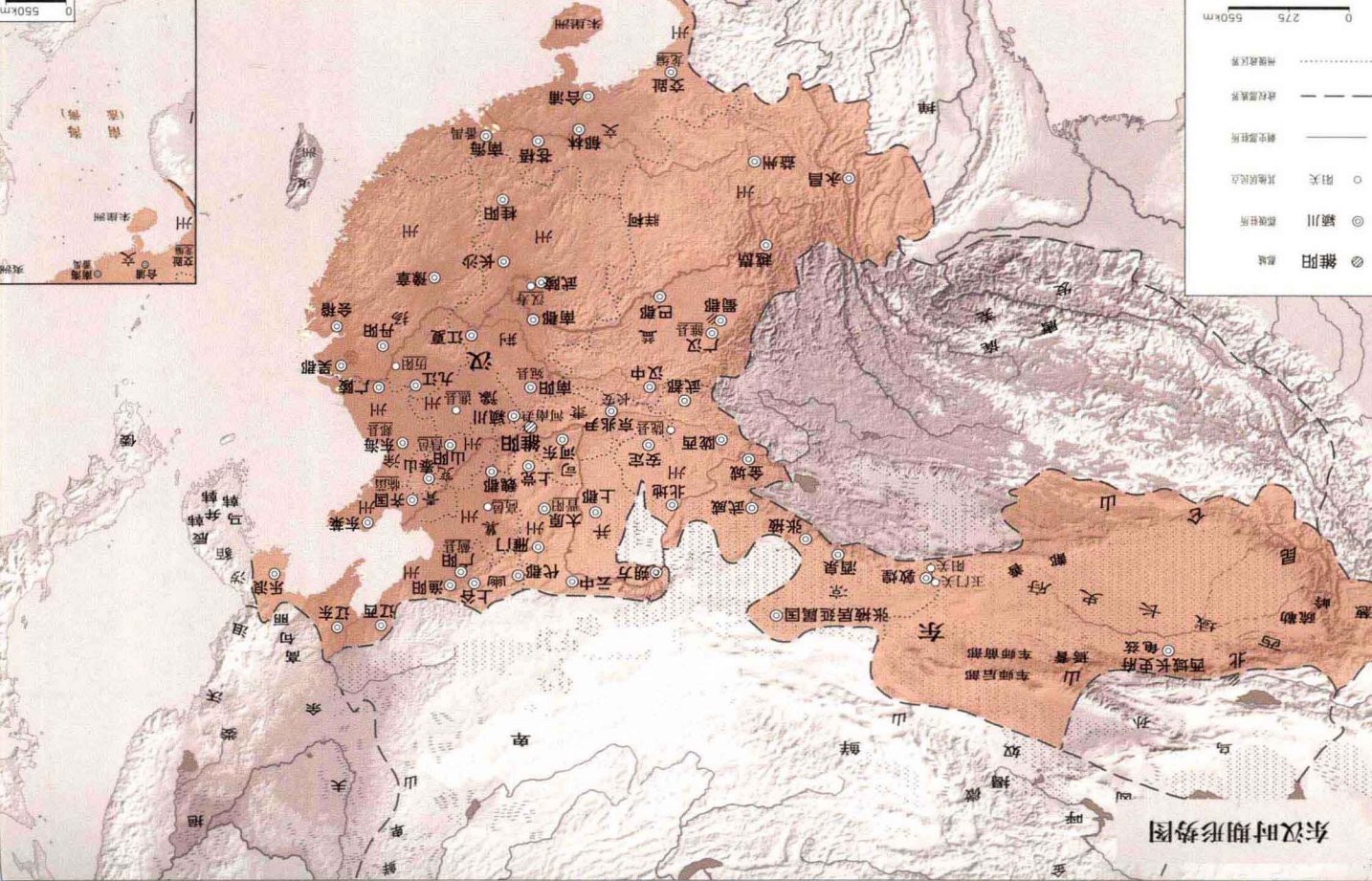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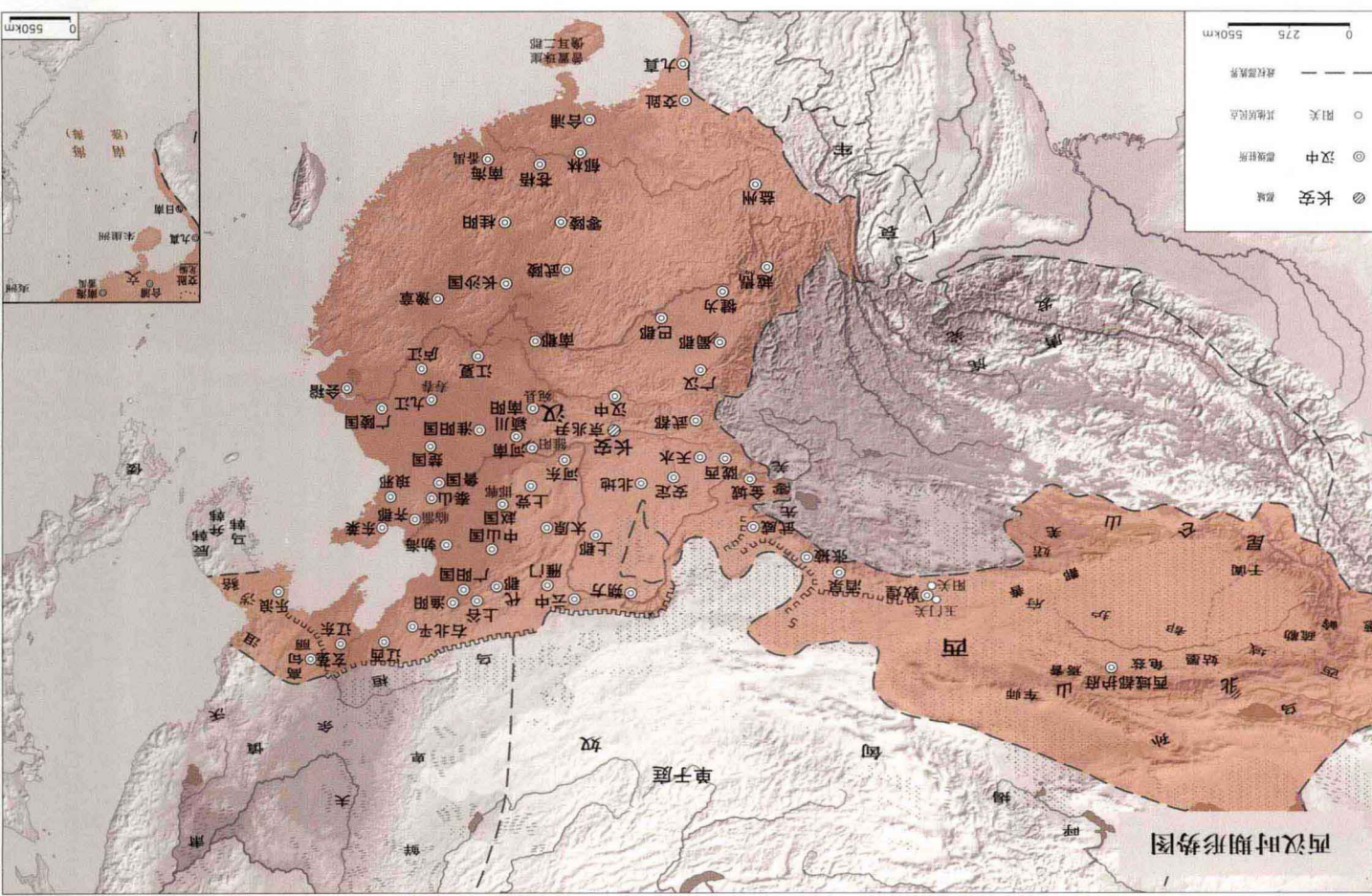
开本：787mm×1092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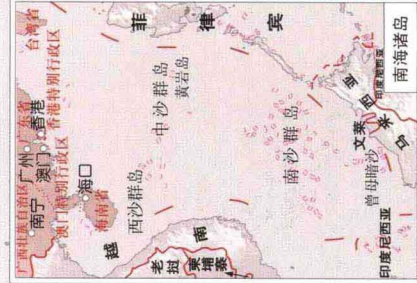
印张：16.75 字数：228千字 图片：170幅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 History of China

03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編集委員】

砺波 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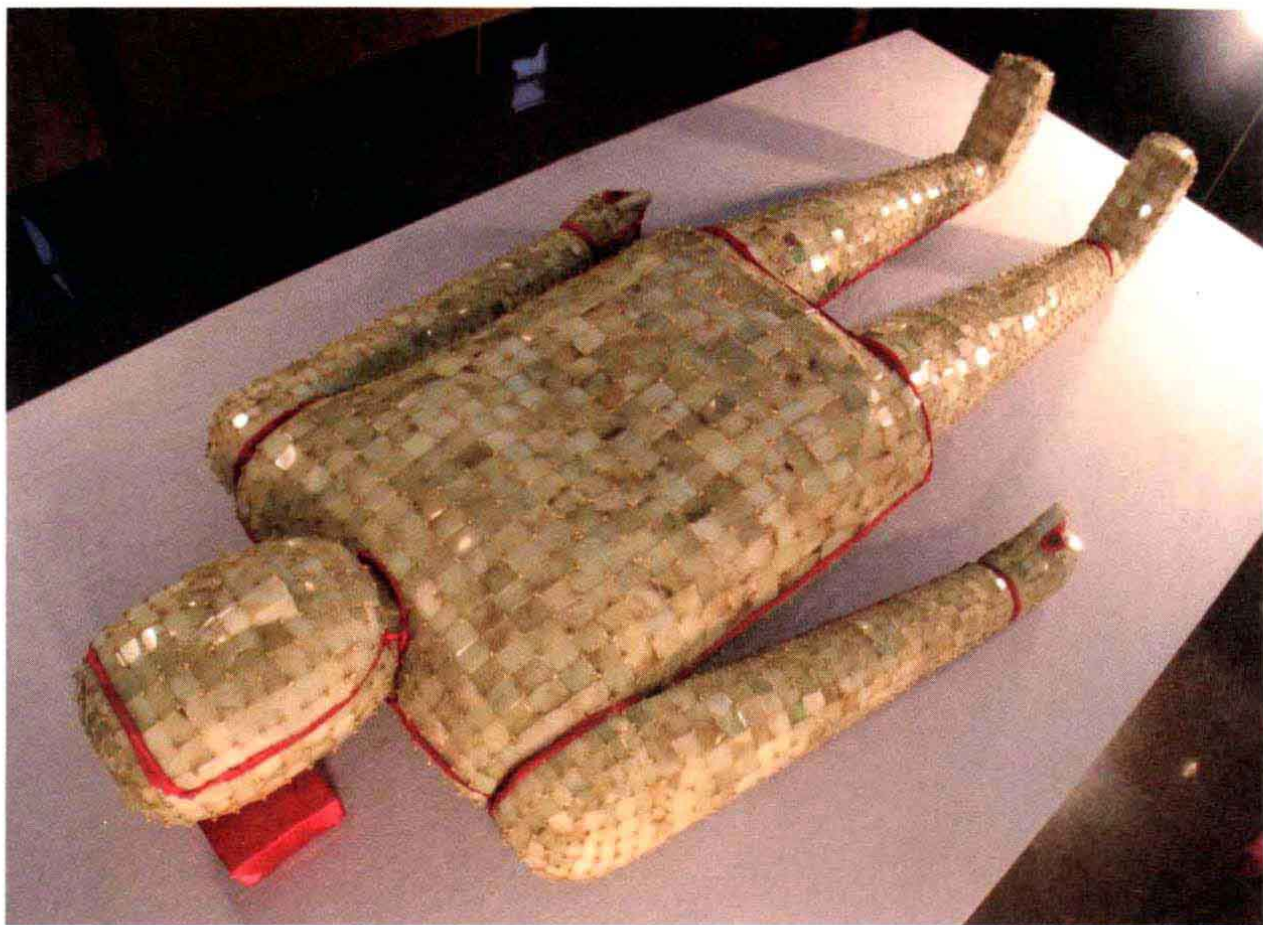
尾形 勇

鶴間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王子今



图一

【玉衣的时代】

玉衣是穿着于秦汉王侯遗体上的葬服，是不能脱下来的衣服。在汉代这种将玉札（玉片）用缕（线）连缀覆盖于全身的衣服称为玉匣，为的是防止灵魂跑出尸体。秦始皇、刘邦、吕后、武帝的遗体上应该都覆盖有玉衣。汉代南越王的玉衣已被发现。随着秦汉时期的结束，玉衣的时代也消亡了。

图一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金缕玉衣——江苏省徐州有刘邦之弟刘交的封国和楚都彭城。那里还有历代楚王的陵墓。至今已发掘的有北洞山（第二代夷王刘郢客）、狮子山（第三代楚王刘戊）、龟山（第六代襄王刘注）、火山（东汉彭城王刘和）等汉墓，年代相当于文帝、景帝、武帝、东汉献帝时期。1984年在狮子山发现大规模的兵马俑群，后建成了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之后在1991年又发掘了王陵。金缕玉衣的主人据推测为刘戊，他因参加对汉朝造反的吴楚七国之乱最终被迫自杀。这件金缕玉衣由四千多枚于阗产半透明的美丽白玉，以金线连缀而成（徐州市博物馆藏）。

推荐序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实现了统一。秦的统一并非只是兼并六国，即后世人所谓“六王毕，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宫赋》），而且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方式实现了中原文化向北边匈奴控制区和岭南越人居住地的扩展。后者的意义尤其重要。有学者称秦的统一是继商周时代“有着广大统治区域的统一王朝”之后，又经历了“充满了战乱和分裂”的东周时代，实现的“重新统一”（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版，第 7 页）。当然，秦代的“广大统治区域”已经与商周时代的“广大统治区域”完全不同。秦帝国的建立，版图的规模，行政的力度，控制的效能和文化理念的同一，也与商周时代完全不同。秦的政体又为汉帝国所继承并进一步完善。

从秦统一至公元 220 年曹丕代汉，是秦王朝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在两汉之间，又有王莽新朝的短暂统治。在这四个多世纪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都有重要的变化。秦汉人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主要舞台，

进行了生动活泼的历史表演，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突出的进步。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格局和管理形式，也对中国此后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怎样全面地认识和深刻地理解秦汉历史，从司马迁到今天，人们已经探索了两千多年。今天学者对许多秦汉史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异见。我们面前的鹤间和幸著讲谈社版《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中译本，提供了与许多中国学者视角有所不同的对中国秦汉史的另一种说明。

鹤间和幸是日本从事中国秦汉史研究成就卓然的学者，多有质量优异的论著面世。他的这部《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秦汉历史。这部专著虽然更多地侧重于秦与西汉史的论说，但是对于东汉史的分析，依然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亮点。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发现以后，又有若干有益于说明秦汉历史的新的出土文献面世。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新资料的利用，正是鹤间和幸这部著作显著的优异之处。此外，陕西秦汉考古学者近年的工作成绩，如张安世家族墓地的发掘信息，汉长安

城宫殿区的考古收获，甚至“张汤印”的发现，都受到作者的注意，及时作为最新资料用以说明和印证自己的学术论点，体现出《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作者站立于学术前沿的立场。书中对于汉长安城周边自然环境的介绍，对于东汉自然灾害影响人文历史的思考，也都反映了作者对生态环境史予以重视的可贵的学术新识，可以给我们有意义的文化启示。

中国古史研究学界久有“汉承秦制”的说法。这一见解较早见于《续汉书·舆服志上》、《舆服志下》和《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前者《太平御览》卷六九二及卷七七四引作“董巴《汉舆服志》”、“董巴《舆服志》”。而《续汉书·五行志一》说，“《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譙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可知“汉承秦制”之说汉末已经通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睡虎地秦简秦律的承继关系，也鲜明地显现了这一事实。李学勤先生对于秦汉文化的关系是这样表述的：“秦的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秦统一后，划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随后发展为四十六郡。郡县制的普及，形成了与商、周王朝不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带来了国内各民族文

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秦朝由于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在历史上充分发挥作用；而不久建立的汉朝，其辉煌的文明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版，第 12 页，第 382 页）鹤间和幸著《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将汉帝国的历史文化存在视作“始皇帝的遗产”，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符合历史真实。

尽管主要用意在于向一般读者介绍秦汉历史，并不承负在较深层次进行学术攻坚的任务，但是《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一书依然在若干方面提出了颇为新异的意见。例如，书中写道：据“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理学研究科的植田信太郎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王丽为首的日中共同研究小组”通过古代人骨分析得出的结论，“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关系，西汉末的山东人与中亚的维吾尔和吉尔吉斯人接近”。当然，这样的认识，可能还需要较丰富的资料和较全面的考察的支持。

关注学术成果传播的朋友们都知道译之不易的事实。实际上，自西汉时期起，已经出现了“译官”、“译令”（《汉书》卷

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译长”、“译使”(《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等身份。所谓“译人传辞”(《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已经是作用特殊的文化职任。“译人”这一称谓也成为一种对文化交流负有崇高责任的职业的代号。马彪先生为《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一书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译本在“信、达、雅”诸要素中“信”的方面应当首先可靠。“达”和“雅”当然是很高的要求,译者的努力可以使我们看到成功。特别因译者作为熟悉中国历史学的学者,在译作中也会有自己的学术意识体现。建议读者、特别是有意以此作为学术参考的朋友能够将鹤间和幸教授的原书和马彪教授的译本两相对照,也许会获得更多的阅读收益。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2012年1月17日

中文版自序

本书能够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是笔者的荣幸。本来是用日文写给日本人的外国史读物，现在中国的读者要将其作为自己国家历史的史书来阅读了。但是，就我本意的来说并不希望读者是将本书作为一本由外国人写作的中国史，而是将其作为不问国籍的一名研究者所著的中国史书来阅读。

在此研究领域中，笔者作为日本秦汉史学会的一员，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的秦汉史研究会的不断交流。在日、中秦汉史学者撰写的论文中是没有国境界线的。对于中国最早实现统一的秦汉这一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学者都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基本文献和竹简、木简出土的文字史料，以及考古学资料为依据予以描述的。

然而，所谓历史读物必然要反映著述者的立场。在日本作为从外部观察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的人们，与在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之中生活的人们，他们观察过去的立场自然不会一样。这也许就是历史认识的差异吧。

本书则是将中国、日本都置于东亚这一大背景之中的。秦汉时期的日本列岛，社会与中国相比的话是相当落后的，这是当时的事实。“倭”已经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日本列岛当时还是小国分立的时代，其中的一个小国向汉进行了朝贡。但即便如此，那种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华的角度出发，视边境地域为“夷狄”的观点并不可取。笔者放弃了华夷思想，从多元文化地域集合体的观点对中国进行了描述。

另外，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视角也是很重要的。对于当时中国与古代罗马之间的关系，我不仅记述了东汉时期罗马使节访问中国的直接交流，也看到二者所共同具有的古代社会的时代特性。对于希腊、罗马的古代与中国的古代，我并没有从民主与专制的所谓二元的对比关系进行描述，而是着重探求了同一时代东、西世界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独自而完整出现的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所具有的真相。我认为从民众创造的国家、帝国的视角描述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在当地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对秦汉时期许多遗址进行了长年的调查。踏访了诸如秦汉的都城、皇帝陵、长城、始皇帝巡行路线，郑国渠、都江堰等水利设施，以及黄土高原、黄河

下游流域的许多遗址，还参观了各地的博物馆。调查访问中，我一方面深感文献史料有限，同时又通过亲赴文献所描述的地点进行考察，从而加深了对文献史料的理解。这些成果在本书中可说随处可见。

鹤间和幸

2011 年